

革命历史资料丛书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

江西人民出版社

革命历史资料丛书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南昌

革命历史资料丛书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

孔永松 林天乙 戴金生 编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昌市印刷九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625 插页 1 字数 35万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50

统一书号：7110·500 定价：2.90元

引 言

根据中共中央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的精神，中共湘、鄂、赣、粤、闽等省党组织先后制定武装起义计划。九月，中共湖南省委率先发动湘赣边秋收起义，建立了工农革命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前身），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在中共江西省委指导下，赣西南爆发一系列农民暴动，创建了吉安东固、于都桥头等小块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在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领导下，闽西各地的工农革命运动发展成为武装暴动和土地革命，建立了小块革命根据地。

一九二九年一月，为着粉碎国民党反动派湘、赣两省军队的第三次“会剿”，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主力挺进赣南、闽西，在赣西南、闽西原有革命发展基础上，大力发展地方党组织、地方武装，建立各级红色政权，发动工农群众进行土地革命，逐步地形成了巩固的赣西南及闽西革命根据地。

赣西南、闽西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慌，遂自一九三〇年底至一九三一年秋，调动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大军连续对赣西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三次军事“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根据地党组织和工农群众全力支持下，不仅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而且巩固、扩大了根据地，将赣西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巩固地连成一片，形成以瑞金为中心，包括赣西南（赣江以东部分）纵约四百里、横约三百里及人口二百万左右，和福建西部（包括闽西北部分）纵、横各三百里及人口一百多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又称“中央苏区”）。并于一九三一

年十一月七日在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

自此，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直接领导下，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展更大规模的土地革命斗争，进一步完善、巩固各级红色政权，大力发展农业、工业、教育、卫生、交通、运输、商业等，并在此基础上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更大规模第四次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使中央革命根据地日趋巩固、发展，成为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中心。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前后，分别以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第二次及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连续干扰中央革命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尤其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自一九三一年起，在土地、工商业等方面实行一系列过左政策，在革命队伍内部搞肃反扩大化，对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等手段，在军事上实行正规战、阵地战等等，不仅耗尽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严重脱离群众，以致于不能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五次军事“围剿”，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不得不一九三四年十月实行战略大转移——长征。中央革命根据地全面丧失后，留在赣南、闽西等地的红军游击队，继续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中央红军主力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在长征途中，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总结了经验教训，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同时，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国工农红军，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后，成为取得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胜利的中坚力量；它如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党、建政、建军及土地革命斗争诸方面的经验教训，都为指导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武装开辟赣西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	(1)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对于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总方针的确定.....	(1)
第二节 赣西南与闽西各县的工农武装暴动.....	(11)
第三节 红四军出击赣南挺进闽西.....	(22)
第四节 红四军前委的重大战略决策.....	(34)
第五节 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初步形成.....	(45)
第六节 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53)
第七节 “蛟洋会议”与闽西土地斗争的开展.....	(61)
第八节 打破闽粤赣三省敌军的“会剿”.....	(71)
第九节 党中央“九月来信”与古田会议的召开.....	(79)
第十节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公布.....	(88)
第二章 赣西南和闽西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胜利发展	(95)
第一节 红五军回师井冈山与转战湘鄂赣.....	(95)
第二节 陂头会议与赣西南土地斗争的开展.....	(105)
第三节 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迅速扩大.....	(111)
第四节 闽西与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118)
第五节 赣西南与闽西地方红军的发展.....	(126)
第六节 寻乌调查与南阳会议.....	(133)
第三章 红一方面军的建立和抵制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145)

第一节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形成·····	(145)
第二节	红一军团的建立·····	(152)
第三节	红三军团的建立与进占长沙·····	(159)
第四节	红一方面军的建立与撤围长沙·····	(166)
第五节	红一方面军攻取吉安与罗坊会议·····	(173)
第四章	赣西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挫折·····	(183)
第一节	李立三“左”倾错误在闽西与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贯彻执行·····	(183)
第二节	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成立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开始·····	(192)
第三节	赣西南革命根据地肃“AB团”与富田事变·····	(201)
第四节	肃“社会民主党”与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缩小·····	(211)
第五章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218)
第一节	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218)
第二节	红一方面军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226)
第三节	红一方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235)
第四节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244)
第五节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	(251)
第六节	赣南会议的召开·····	(257)
第六章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265)
第一节	宁都起义与红五军团的建立·····	(265)
第二节	红一方面军撤兵赣州攻克漳州·····	(272)
第三节	福建省与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召开·····	(286)
第四节	地方红军和工农武装的新发展·····	(292)
第五节	水口、乐宜战役与宁都会议的召开·····	(298)
第六节	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307)

第七章	王明“左”倾错误的全面推行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战前准备	(315)
第一节	反“罗明路线”与王明“左”倾错误的全面推行	(315)
第二节	王明“左”倾土地政策的推行与查田运动的开展	(323)
第三节	猛烈扩大红军运动与闽赣、粤赣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334)
第四节	红一方面军进军福建	(343)
第八章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354)
第一节	红色政权的建设	(354)
第二节	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362)
第三节	工业生产与邮电交通事业的草创	(370)
第四节	商业的发展与反经济封锁的斗争	(378)
第五节	财政金融制度上的废旧立新	(388)
第六节	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398)
第九章	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407)
第一节	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开始	(407)
第二节	“福建事变”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召开	(415)
第三节	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召开	(422)
第四节	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节节失利	(428)
第五节	红一方面军战略转移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437)
第十章	中央革命根据地留守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 ...	(448)
第一节	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从集中抗敌到分散游击	(448)
第二节	粤赣与闽赣边红军的游击战争	(456)
第三节	闽西红军的游击战争	(465)

第四节 国共合作的形成与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	(472)
结束语.....	(482)
后记	(484)
附录一：中央革命根据地行政区划沿革表	(485)
附录二：中央革命根据地区域图	(486)

第一章

武装开辟赣西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对于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总方针的确定

一九二七年春夏，正当国共两党合作领导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胜利向前发展，工农革命运动在大江南北蓬勃兴起的时刻，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勾结帝国主义，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由于中国共产党当时还比较幼稚，又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致使生机勃勃的大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中国革命由此转入低潮。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极为宝贵和深刻的经验教训：

第一、要取得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必须建立一条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革命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对资产阶级必须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

第二、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和中心内容，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因此，只有坚决依靠农民作为自己的同盟军，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才能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第三、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军队是中国革命的主

要组织形式。没有革命的武装，就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不可能夺取政权和取得革命的胜利；

第四、党的建设是巩固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和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当着党有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广大党员和干部积极地参加革命斗争，党的组织发挥巨大战斗作用时，革命就发展、前进。而当着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还没有完整的、正确的、统一的了解，很好地结合，特别是机会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占据统治地位时，革命便必然遭到挫折、失败。

失败乃成功之母。中国共产党正是从大革命惨重失败的经验教训之中，在彻底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同时，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力挽狂澜，将中国的民主革命推进到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

关于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问题，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大革命后期即已提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之后，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九日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与会代表毛泽东、任弼时、瞿秋白等的斗争下，大会通过决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和他过去在中央领导工作中的右倾错误。大会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明确指出：“现在阶段之中，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指土地革命——笔者）”。^①在农民政纲中规定，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的土地，交给农民耕种，但“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②

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指出：“现在革命的趋势，是要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派的土地，以贫农为中坚，建立农民的政权。”在乡村中，“取消地主绅士所有的一切政权

① 《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1927年5月。

② 《土地问题议决案》，1927年5月。

及权力，建立农民的乡村自治政府”。“在这种斗争中农民武装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要“解除乡村中反动势力的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保障自治政府及革命的胜利”。在城市里，党应当积极领导工人从事政治和经济斗争，加强工人阶级的团结，组织工人阶级的武装，使工人武装成为保卫民主政权的武装之一。

中共“五大”所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是很不彻底的，并不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由于大会仍选举陈独秀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负责全党的领导工作。因此，这个议决案会后并未实施，迫切的土地问题实际上被否定了。至于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问题，也根本没有提到党的工作的议事日程上。所以，中共“五大”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一九二七年五月间，共产国际召开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同时，对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出两个紧急指示。五月十三日，斯大林发表了《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一系列指示和意见中，反复建议中国共产党要大力发展革命势力，深入发动农民运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建立可靠的武装，改造武汉政府。并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必须掌握领导权。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这一系列指示和建议，实际上补充了中共“五大”决议案中没有谈到或者虽然谈到而未能彻底解决的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把持下的党中央，以及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鲍罗庭等，却拒绝接受这些正确的指示和建议，甚至把它们扣压下来，不让党内更多的同志知道。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前夕，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于七月十二日改组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组成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停止了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在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同时，与陈独秀一起推行右倾投降主义的共产国际代表和顾问鲁易、鲍罗庭也奉调离职。这就终于结束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统治，使土地

革命和武装斗争开始提到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上。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发表对于时局的宣言，揭露汪精卫等所把持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反革命罪行，公开宣布中共党员退出武汉国民政府，并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任务。为了反击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进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又迅即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委派周恩来组织中共前敌委员会，负责指挥举行南昌起义。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张太雷同瞿秋白等人，先后在九江和庐山会晤，具体商讨在南昌举行起义、发动土地革命问题。在七月下旬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九江会议上，周恩来向在九江的李立三、恽代英等传达了临时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征求他们对此决定的意见。会议还讨论了起义的中心口号、土地革命等问题。在讨论土地革命政纲时，曾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由于李立三、恽代英和周恩来的坚持，确定南昌起义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口号，以“没收大地主土地”等内容为起义政纲。^①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北伐军三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胜利地占领了南昌城。八月三日至五日，起义部队按预定计划分批撤离南昌，取道抚州、宜黄、广昌南下广东，试图建立根据地，并依靠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组织力量，重新北伐。十月初，起义部队经闽西进入潮州、汕头地区时，遭到优势敌人的围攻而失败。余部一部分转移到海丰、陆丰，同当地的农民武装结合；另一部约二千人，由朱德、陈毅率领，经闽西转入赣粤湘边开展游击战争。

南昌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公开树起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旗帜，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

^① 见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

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南昌起义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起义的领导决策机关选择了回师广东，试图占领海口的中心城市以求得外援，重走北伐战争老路的错误战略方向。这一严重失策，致使起义部队没有就地深入农村，发动广大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党在南昌起义胜利后虽然作出了“没收二百亩以上大地主土地”的决定，在起义部队南进广东途中又提出“没收土地”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并将“没收二百亩以上大地主土地”改为“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的土地”。^①但是，在南昌起义的整个过程中，党对于土地革命仍停留在研究阶段，口头上的争论多于实际行动，而且迟迟统一不起来，这就妨碍了及时地提出正确的和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

南昌起义的胜利和失败，是同大革命的胜利和失败相关联的。它说明处在革命转折紧急关头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武装反抗，并将土地革命作为口号和目的，但是却不能够立即把武装斗争同土地革命直接联系起来，及时转入农村，以武装斗争之矢，射土地革命之的。可见，进一步确定新的革命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任务，已经迫切地、刻不容缓地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瞿秋白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在其“告全党党员书”中明确指出：“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现时主要的是要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几千百万农民自己自下而上的解决土地问题，而共产党则应当做这一运动的领袖”。

在“八·七”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中明确规定：“没收重利盘剥者的财产”，“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堂庙宇等土地”，分配这些土地和财产给佃农及

^① 见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

无地的农民。而对于小地主则实行“减租”。决议说明，现在之所以不提出没收小地主的土地，是为了在最近即将开始的秋收暴动中，“要使城乡间广大的小私有财产者之分子中立”。

关于武装斗争问题，出席会议的毛泽东在发言中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思想。他强调指出：今后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①瞿秋白也在最后代表常委向大会作报告时指出，现在主要的是要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我们的军队则完全是帮助土地革命的。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武装，有这样好的机会，这样多的力量，我们必须要点燃这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②

“八·七”会议通过认真讨论，确定了组织农民举行秋收暴动的政策。在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中明确规定：“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来发动和组织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在极短期间调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尽量分配到各主要的省份作农民暴动的组织者”。这个决议表明，党中央已把发动农民武装起义摆到了重要地位。

“八·七”会议还强调了工农武装暴动相结合的意义。在会议通过的《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中提出：要“注意于武装工人及其暴动巷战等军事训练，即刻准备能响应乡村农民暴动，而推翻反革命的政权”。“工人阶级应时刻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以乡村农民之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政权，而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权的城市政府”。

“八·七”会议最后选出临时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有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

①、② 见《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第8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

时九人。候补委员有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七人。随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以加强党对全国各地革命运动的领导。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八·七”会议决定在广大区域中发动和组织农民举行秋收暴动，这不仅表明中国共产党决心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而且把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直接联系起来，从而给党和人民指出了正确的革命斗争道路。这正如毛泽东所说：“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①

“八·七”会议也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之处。例如，没有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和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过分地强调了进攻，因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单纯的工人成份的意义等。

“八·七”会议结束后，在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总方针的指导下，从一九二七年秋冬至一九二八年春夏，一大批杰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优秀党员，先后在全国的广大区域内，领导广大工人、农民、士兵、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群众，不断地举行了武装的抵抗，有力地反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其中，九月九日，中共湖南省委和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被派到湖南的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参加起义的部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卢德铭任总指挥，毛泽东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当起义部队分别从修水、铜鼓、安源等地向浏阳、长沙进攻受挫后，奉命集合于浏阳县文家市。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在文家市召开前委会议，讨论部队的进军方向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反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3页。

对了直取浏阳、攻打长沙的错误意见，决定率领部队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进军。九月二十日，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开始了向井冈山的伟大战略进军。九月二十九日，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境的三湾村进行了改编，将原来的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同时，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为建立一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型革命军队奠定了基础。十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开始进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一九二八年一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从粤北进入湘南地区。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领导了宜章年关暴动，揭开了湘南暴动的序幕，随后解放了郴州、永兴、耒阳、资兴等县城。四月，在毛泽东率领的井冈山工农革命军接应下，朱德、陈毅带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暴动农军，上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五月四日，两支部队正式组成当时最强大的一支工农武装——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随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军委书记（后改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十、十一、十二师。五月底，红四军取消师的番号，缩编为四个团约五千余人。

为了总结南昌起义，特别是“八·七”会议以来各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总方针的经验教训，并制定继续斗争的策略，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在瞿秋白主持下，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职工运动决议案》等。会议强调批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党内的悲观情绪，重申了党中央九月份提出的关于放弃使用国民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旗帜和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的决定。会议还坚决反对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对小地主土地实行“减租”的改良主义办法，提出“完全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由农民代表会议自己支配给贫农耕